

· 文学史研究丛书 ·

# 被压抑的现代性

## ——晚清小说新论

〔美〕王德威 著  
宋伟杰 译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· 文学史研究丛书 ·

# 被压抑的现代性

## ——晚清小说新论

〔美〕王德威 著  
宋伟杰 译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  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被压抑的现代性——晚清小说新论/[美]王德威著. —北京:  
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5.5

(文学史研究丛书)

ISBN 7-301-08492-7

I. 被… II. 王… III. 小说-文学研究-中国-清后期  
IV. I20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8751 号

*Fin-de-Siècle Splendor: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, 1849-1911*

© 1997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. All rights reserved.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.

图字:01-2003-5328

书 名: 被压抑的现代性——晚清小说新论

著作责任者: [美]王德威 著 宋伟杰 译

责任编辑: 张凤珠

标准书号: ISBN 7-301-08492-7/I·0712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cbs.pku.edu.cn> 电子信箱: [pkuwsz@yahoo.com.cn](mailto:pkuwsz@yahoo.com.cn)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

排 版 者: 北京军峰公司

印 刷 者: 北京大学印刷厂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890mm×1240mm A5 13.75 印张 357 千字

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0.00 元

---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

## “文学史研究丛书”总序

陈平原

中国学界之选择“文学史”而不是“文苑传”或“诗文评”，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，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。从文学观念的转变、文类位置的偏移，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，“文学史”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。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，“文学史”在 20 世纪的中国，产量之高，传播之广，蔚为奇观。

从晚清学制改革到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展开，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，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。在此过程中，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：林传甲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（1904）还只是首开记录，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，如姚永朴的《文学研究法》、刘师培的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和《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》、黄侃的《文心雕龙札记》、吴梅的《词余讲义》（后改为《曲学通论》）、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、胡适的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和《白话文学史》、周作人的《欧洲文学史》和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，以及俞平伯的《红楼梦辨》、游

国恩的《楚辞概论》等。这些著作，思路不一，体式各异，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。

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，并无“惟我独尊”的妄想，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；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，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。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，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，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，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。

在很长时间里，人们习惯于将“文学史研究”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（或教材式的“文学通史”），其实，“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”，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，尽可不必画地为牢。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，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，也都各具面目，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。

那是一个“开天辟地”的时代，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，但生气淋漓，至今令人神往。鲁迅撰《〈中国小说史略〉序言》，劈头就是：“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”；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：“有之，自鲁迅先生始。”当初的处女地，如今已“人满为患”，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？胡适撰《〈国学季刊〉发刊宣言》，以历史眼光、系统整理、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，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。今日中国学界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，早就超越胡适的“三原则”，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？

当初鲁迅、胡适等新文化人“整理国故”时之所以慷慨激昂，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。今日中国，能否有此迹象，不敢过于自信，但“新世纪”的诱惑依然存在。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，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。

在 20 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，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，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。在 20 世纪中国，相对于传统文论，“文学史”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。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，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，如何洗心革面、奋发有为，值得认

真反省。

反省之后呢？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——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。

1999年2月8日于西三旗

## 中文版序

王德威

在中国叙事文学的研究里，晚清小说一向不受重视。但不论从历史、美学、意识形态及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看，此一时期的小说所显现的活力及复杂面向，都足以让人大开眼界。尤其对治现代文学者而言，晚清小说岂止仅代表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；它的出现，还有它的被忽视，本身就已经见证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端。

《被压抑的现代性——晚清小说新论》原以英文形式，于1997年由斯坦福大学(Stanford University)出版。借着“五四”以来已有的研究成果，我试图对晚清小说做更深入的考察。我将“晚清”的时代范围扩及到鸦片战争以后，并力求打破以往“四大小说”或“新小说”式的僵化论述。我更希望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新兴文化场域，就其中的世变与维新、历史与想象、国族意识与主体情操、文学生产技术与日常生活实践等议题，展开激烈对话。书中的四章专论——狎邪艳情、侠义公案、谴责黑幕、科幻奇谭——因此不应只视为文类

研究而已,而是指向四种相互交错的话语:欲望、正义、价值、真理(知识)。我认为这四种话语的重新定义与辩难,适足以呈现20世纪中国文学及文化建构的主要关怀。

本书英文版出版后在学界曾获得不少反响。评者的赞弹,自应付诸公论,惟有一二说法与我的立论相去太远,或有必要在此聊志数语。对此书最主要的保留声音认为,晚清说部如此被抬举,已有贬低“五四”新文学传统、厚古薄今之嫌;而将现代性的发展回溯至19世纪中叶,亦回避了历史进程的必然性。同一声音甚至指陈本书凭借后现代、后乌托邦式修辞,否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意识形态的“现代化”大计及成果。

这类论者切切要将晚清小说“被压抑的现代性”再压抑下去,不仅使人莞尔:他们到底怕些什么?事实上,本书的《导论》正始于如下的问题:文学现代性是否必须按照特定历史时间表依序进场候教?现代性是否只能有一种品牌、来源及出路?现代性的“意识”甚至意识形态是否有如神谕,只能由图腾式的作家或作品(或国家领导人或西方理论大师)说了算?还有文学的(形式)现代性是否需要社会、历史的(实践)现代性来决定?我们学界的一支一方面高谈“一切历史化”,一方面将文学史神话化,已是一种奇观。至于部分论者绝不细读文本,就着陌生的小说演述自己的大说,甚至引喻失义,只能说是新版的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”了。

“重写文学史”曾是上个世纪末两岸学者共同努力的方向。在这个方向下,《被压抑的现代性》只能算是初步的尝试。而我已一再申明,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文学启蒙与文学革命的教训,我们(又一次)重写文学史的活动必须在文学及历史千丝万缕的对话关系中,化简为繁,迂回前进。而介于新旧之交的晚清小说,恰好提供了最丰富的研究对象。我的目的不在成一家之言,而是希望对中国现代文学众声喧哗的起源,做出适切的描述。

本书的写作过程,有幸得到许多学者的建议及批评。哥伦



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数篇有关晚清文学的专论,对我有极大的启发之功。本书英文初稿亦承夏先生审阅校正。台湾的柯庆明、张淑香、林明德、赖芳伶、康来新、李瑞腾、李孝悌、黄锦珠,欧美的米列娜(Milena Doleželová-Velingerová)、韩南(Patrick Hanan)、李欧梵、瓦格纳(Rudolf Wagner)、叶凯蒂,日本的樽本照雄,还有大陆及香港的郭延礼、陈平原、夏晓虹、杨义、王宏志、汪晖、袁进等先生女士的著作或洞见,都令我受益匪浅。陈平原教授的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》、米列娜教授主编的《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》(*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*)各在方法学上有重要突破,也提供我可贵的研究线索。而柯庆明教授与我多次讨论,尤其使我对传统与现代、中学与西学的脉络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。

本书的中译,《导论》部分由我自己执笔,其他各章由宋伟杰博士完成。惟第一章原稿曾由胡晓真博士译出,再由宋伟杰参照定稿。晓真及伟杰分别是我在台大及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,早已学有所成,他们愿意承担此书的翻译,是我的荣幸。尤其伟杰为此书所投注的热情与精力,在在令人感动。译文完稿后又经我修订数次,因此如有任何讹误,自然应由我负责。

## 目 录

“文学史研究丛书”总序·····	陈平原(1)
中文版序·····	王德威(1)
导论:没有晚清,何来“五四”?·····	(1)
<b>第一章 被压抑的现代性</b> ·····	(20)
一 启蒙与颓废·····	(30)
二 革命与回转·····	(36)
三 理性与滥情·····	(42)
四 模仿与谑仿·····	(48)
<b>第二章 寓教于恶</b>	
——狎邪小说·····	(66)
一 异性恋·同性恋·假凤虚凰·····	(74)
二 溢爱与溢欲·····	(84)
三 欲望之城·····	(102)
四 从神女到女神·····	(113)
<b>第三章 虚张的正义</b>	
——侠义公案小说·····	(138)
一 重写《水浒传》·····	(145)
二 虚张的正义·····	(157)
三 女侠的雌伏·····	(174)
四 罪抑罚?·····	(193)
<b>第四章 荒凉的狂欢</b>	

2 被压抑的现代性——晚清小说新论

——丑怪谴责小说·····	(213)
一 魅幻的价值论·····	(222)
二 荒唐世界·····	(240)
三 翻译现代性·····	(253)
四 中国牌的荒诞现实主义·····	(271)
<b>第五章 淆乱的视野</b>	
——科幻奇谭·····	(291)
一 奔雷车·参仙·乾元镜·····	(297)
二 顽石补天·····	(309)
三 飞天遁地·····	(326)
四 回到未来·····	(341)
<b>第六章 归去来</b>	
——中国当代小说及其晚清先驱·····	(363)
一 新狎邪体小说·····	(366)
二 英雄主义的溃散·····	(372)
三 “大说谎家”的出现·····	(378)
四 “新中国”的遐想·····	(383)
<b>索引</b> ·····	(392)
<b>引用书目</b> ·····	(406)

## 导论：没有晚清，何来“五四”？

有关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问题，近年屡屡被提出讨论。“五四”文学革命的典范意义，尤其引起众多思辨。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，当属晚清文化的重新定位。传统解释新文学“起源”之范式，多以“五四”（1919年文学革命的著名宣言）为中国文学现代时期之依归；胡适、鲁迅、钱玄同等诸君子的努力，也被赋予开山宗师的地位。相对的，由晚清以迄民初的数十年文艺动荡，则被视为传统逝去的尾声，或西学东渐的先兆，过渡意义，大于一切。但在世纪末重审现代中国文学的来龙去脉，我们应重识晚清时期的重要，及其先于甚或超过“五四”的开创性。

我所谓的晚清文学，指的是太平天国前后，以至宣统逊位的六十年；而其流风遗绪，时至“五四”，仍体现不已。在这一甲子内，中国文学的创作、出版及阅读蓬勃发展，真是前所未见，并在世纪转折交替处，或“世纪末”（fin-de-siècle）之际，蔚为高潮。小说一跃而为文类的大宗，更见证传统文学体制的剧变。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推陈出新、千奇百怪的实验冲动，较诸“五四”，毫不逊色。然而中

国文学在这一阶段现代化的成绩,却未尝得到重视。当“五四”“正式”引领我们进入以西方是尚的现代话语范畴,晚清那种新旧杂陈、多声复义的现象,反倒被视为落后了。

晚清文学的发展,当然以百日维新(1898)到辛亥革命(1911)为高潮。仅以小说为例,保守地估计,出版当在两千种以上。<sup>[1]</sup>其中至少一半,今已流失。这些作品的题材、形式,无所不包:从侦探小说到科幻奇谭,从艳情纪实到说教文字,从武侠小说到革命演义,在在令人眼花缭乱。它们的作者大胆嘲弄经典著作,刻意模仿外来文类,笔锋所至,传统规范无不歧义横生,终而摇摇欲坠。以往“五四”典范内的评者论赞晚清文学的成就,均止于“新小说”——梁启超、严复等人所提倡的政治小说。殊不知“新小说”内包含多少旧种子,而千百“非”新小说又有多少诚属空前的创造力。

而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看,晚清文人的大举创作(或捏造与制造)小说的热潮,亦必要引起文学生态的巨变。这是一个华洋夹杂、雅俗不分的时期,而读者不论有心无心,也乐得照单全收。中国现代文学的大规模量贩化、商业化,非自今始。<sup>[2]</sup>称小说为彼时最重要的公众想象领域,应不为过。借着阅读与写作小说,有限的知识人口虚拟家国过去及未来的种种——而非一种——版图,放肆个人欲望的多重出路。比起“五四”之后日趋窄化的“感时忧国”正统,晚清毋宁揭示了更复杂的可能。

晚清的最后十年里,至少曾有一百七十余家出版机构此起彼伏,<sup>[3]</sup>照顾的阅读人口,在两百万到四百万之间。<sup>[4]</sup>而晚清最重要的文类——小说——的发行,多经由四种媒介:报纸、游戏小报、小说杂志与成书。早在19世纪70年代,小说即为报纸这一新兴出版媒介的特色之一。中国最早的报纸《申报》(1872—1949)于1872年即有名为《瀛寰琐记》的文学专刊出版,发表诗文说部创作或翻译。<sup>[5]</sup>到了1892年,由韩邦庆(1865—1894)一手包办的《海上奇书》出版,是为现代小说专业杂志的滥觞。<sup>[6]</sup>同

时,在标榜“游戏”及“消闲”的风月小报上,小说也觅得一席之地。这些刊物可查者至少仍有 32 种之多,譬如《指南报》与《游戏报》;晚清红极一时的作者如吴趼人(1866—1910)、李伯元(1867—1906)且编且撰,都是由此起家。<sup>[7]</sup>而在梁启超提倡“新小说”的热潮后,至少又有三十余家小说出版社,<sup>[8]</sup>以及 21 种以“小说”为名的期刊出现。<sup>[9]</sup>其中最著名的,即所谓《新小说》(1902—1906)、《绣像小说》(1903—1906)、《月月小说》(1906—1908)、《小说林》(1907—1908)等“四大”小说杂志。<sup>[10]</sup>按照樽本照雄《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》(1998)的统计,晚清创作小说共达 7466 种。

晚清也是翻译文学大盛的时代。晚清小说研究的拓荒者之一阿英早已指出,晚清的译作不在创作之下,基于阿英的晚清小说目录,有论者稽考出 479 部创作、628 部译作。<sup>[11]</sup>近年学者陈平原就此统计 1899—1911 年间,至少有 615 种小说曾经译介至中国;<sup>[12]</sup>而樽本照雄近年编订的目录里,确认出 1840—1911 年间,至少有 2545 种翻译小说。狄更斯(Charles Dickens)、小仲马(Alexandre Dumas fils)、雨果(Victor Hugo)、托尔斯泰(Leo Tolstoy)等,均是读者耳熟能详的名字。至于畅销作家,则有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·道尔(A. Conan Doyle)、感伤奇情作家哈葛德(H. Rider Haggard),以及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(Jules Verne)等名列前茅。<sup>[13]</sup>

但我们对彼时文人“翻译”的定义,却须稍做厘清:它至少包括意译、重写、删改、合译等方式。学者如史华慈(Benjamin Schwartz)、夏志清及李欧梵曾各以严复(1854—1921)、梁启超(1873—1929)及林纾(1852—1924)为例,说明晚清译者往往借题发挥,所译作品的意识形态及感情指向,每与原作大相径庭。不仅如此,由于这些有意无意的误译或另译,晚清学者已兀自发展出极不同的“现代”视野。<sup>[14]</sup>作为文化交往的形式之一种,翻译每每受限于历史必然及偶然。<sup>[15]</sup>以此类推,晚清作者对传统古

典的新奇诠释,也是另一种以意逆志的“翻译”。

西洋、东洋文学的影响,一向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主要关目。此一方面的研究,亦犹待加强。但就在作者、读者热烈接受异国译作,作为一新耳目的蓝本时,传统说部早已产生质变。当《荡寇志》(1853)成为太平天国时期,清廷及太平军文宣战争的焦点时,小说与政治的主从关系,迈入了新的“技术”模式。当《品花宝鉴》(1849)以男女易装的观点,混淆异性及同性恋爱的界限时,小说与情色主体的辩证,也变得益发繁复。几乎所有经典说部,从《水浒传》到《红楼梦》,均在此时遭到谐仿。晚清世纪末也许是作者自甘颓废、惫懒因袭的征兆,但更可能是他们不耐传承藩篱,力图颠覆窠臼的讯号。

不仅如此,清末重被发掘的稍早作品,如1877年发现的沈复(1763—?)的《浮生六记》,以及1879年付梓的张南庄(19世纪)的《何典》,更具有在文学传统以内另起炉灶的意义。<sup>[16]</sup>《浮生六记》描摹情性自主的向往、《何典》夸张人间鬼域的想象,对20世纪作家的浪漫或讽刺风格,各有深远影响。《何典》依循以往话本小说鲜活活泼的市俗叙述,并点染极具地域色彩的吴语特征,自然可视为“五四”白话文学的又一先导。<sup>[17]</sup>凡此皆说明“新小说”兴起前(严复与梁启超分别于1897和1898年,推倡中国小说的改革路线应以日本与西方小说为准),中国说部的变动,已不能等闲视之。西方的冲击并未“开启”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,而是使其间转折更为复杂,并因此展开了跨文化、跨语系的对话过程。这一过程才是我们定义“现代性”的重心。

晚清小说的丰富性既如上述,则显然与过去多年来学者投入的心力不能成为正比。80年代的《晚清小说大系》(台北:广雅出版有限公司)、90年代的《近代中国小说大系》(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)及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》(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),在资料上已渐补正以往之不足。但研究方面,仍不脱以往

“四大小说”（《官场现形记》、《孽海花》、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、《老残游记》）的窠臼；阿英、鲁迅、胡适等以“五四”为视角的理论，依旧被奉为圭臬。

这牵涉到我们怎么定义“现代”中国文学的问题。“五四”运动以石破天惊之姿，批判古典，迎向未来，无疑可视为“现代”文学的绝佳起点。然而如今端详新文学的主流“传统”，我们不能不有独沽一味之叹。所谓的“感时忧国”，不脱文以载道之志；而当国家叙述与文学叙述渐行渐近，文学革命变为革命文学，主体创作意识也成为群体机器的附庸。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，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表征，但中国文学的“现代性”却不必化约成如此狭隘的路径。我无意在此作翻案文章；在这个所谓“放逐诸神”、“告别革命”的时代，再高唱“推翻”典范、“打倒”传统，也无非是重弹“五四”的老调。要紧的是重理世纪初的文学谱系，发掘多年以来隐而不彰的现代性线索。

凭借“被压抑的现代性”这一题旨，我想追问的是，究竟是什么使得晚清小说堪称现代，并以之与“五四”传统所构造的现代话语相对应？又是什么阻止我们谈论晚清时期被压抑的多重现代性？更为重要的是，在一个后现代性成为风行话语之一种的时代，凸显晚清小说现代性之种种，此举策略性的意义何在？

“现代”一义，众说纷纭。如果我们追根究底，以现代为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意识，一种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，则晚清小说家的种种试验，已经可以当之。<sup>[18]</sup>别的不说，单就多少学说创作、书籍刊物，竟以“新”字为标榜，即是一例。从《新石头记》（1908）到《新中国未来记》（1902），有心作者无不冀求在文字、叙述、题材上挥别以往。诚然，刻意求新者往往只落得换汤不换药，貌似故步自封者未必不能出奇制胜。重要的是，无论意识形态的守旧或维新，各路人马都已惊觉变局将至，而必须采取有别过去的叙写姿态。

有心者可以反诘，这种传统之内自我改造的现象，以往的文



学史不是已屡有前例可循？晚明时期诗文小说的中兴，只是其中之一。何以我们不称之为“现代”呢？<sup>[19]</sup>我的回应，是将晚清文学重新放回历史语境之中。晚清之得称现代，毕竟由于作者读者对“新”及“变”的追求与了解，不再能于单一的、本土的文化传承中解决。相对地，现代性的效应及意义，必得见诸 19 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、技术及权力交流的网路中。<sup>[20]</sup>

但有心者仍可反诘，以往中国的文学，不亦曾有异邦因素的融合介入？六朝以降，西域佛学母题及叙写形式的传播；唐代中亚音乐模式的引进，对古典中国的诗词叙述，均造成深远影响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仍须体认清末文人的文学观，已渐脱离前此的中土本位架构。面对外来冲击，是舍是得，均使文学生产进入一个“现代的”、国际的（却未必是平等的）对话情境。“国家”兴起，“天下”失去，“文学”也从此不再是放诸四海的艺术表征，而成为一时一地一“国”的政教资产了。准此，我们不妨复习文学史家所一再传述的中国现代文学现象：民主思维的演绎、内在心理化及性别化主体的发掘，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生产的体制化，都市/乡村视景的兴起，革命神话的建立，还有最重要的，线性历史时间感的渗透。这些现象既是作家创作的条件，也是他们描摹的对象。但只要把眼光放大，我们则知所有这些现象均可见诸西方，而且经过长期实验，方底于成。<sup>[21]</sup>当它们移入清末中国这样的非西方文明中，却失去时间向度，产生了立即性的迫切感。它们散发着符咒般的魅力，催促一代中国人迎头赶上。识者称现代中国文学建立在一种“亏欠的话语”上，不是虚言。<sup>[22]</sup>清末以来的作者与读者觉得我们“总已”难偿历史进程的时差，如果不继续借镜，或借贷，西方的文化及象征资本，更是无以为继。

以上的描述，也许已说明现代中国文学产生的环境或条件，却不能说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。文学的“现代性”有可能因应政治、技术的“现代化”而起，但并无形成一种前后因果的必然性。<sup>[23]</sup>让我们再思前述“现代”一词的古典